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共教育路線變遷與教育政策發展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inland China

doi:10.30390/ISC.200205_41(3).0007

問題與研究, 41(3), 2002

Issues & Studies, 41(3), 2002

作者/Author：劉勝驥(Sheng-Chi Liu)

頁數/Page：143-17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5_41\(3\).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5_41(3).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共教育路線變遷與 教育政策發展

劉 勝 驥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毛澤東對於「實踐」非常重視，【實踐論】（與西方的實用主義有差異）成為他的教育哲學。早期毛澤東就提倡從幹中學習。①這種偏重感性知識，強調經驗主義的講話，與毛澤東以後反對多讀書，反對「本本主義」，輕視理性知識的立場相一致。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想把大陸教育辦成「延安式抗日大學」，即「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但實際推行教育政策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採行蘇聯式教育路線，教育目標為「培養又紅又專」的建設人才。毛澤東教育路線延至文化大革命方才實現，果然造成教育素質的大倒退。

鄧小平收拾文革殘局，希望把中國大陸建設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即從大陸現實國情出發，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圍繞著這個概念和結論，形成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②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方針，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確立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路線，也開啟了以開放改革為標榜的鄧小平時代。而教育則服務於經濟發展，形成「科教興國」的社會發展戰略。

江澤民掌權後表態堅定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中共在十二大和十三大都把教育列為戰略重點決策，十四大上江澤民指出「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十五大和第九屆人大都表示沿著鄧小平道路前進，整體而言是強調教育的，但投入教育經費的比重和重視程度仍遜於鄧小平。

關鍵詞：中國大陸、教育發展、教育政策

* * *

註① 毛澤東對於「實踐」非常重視，他說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見毛澤東 1936 年 6 月 8 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話，引自毛澤東著，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頁 67。

註② 鄧小平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講話中指出：「要把經濟建設當做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它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著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衝擊它。」見鄧小平著，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 月），頁 214。



壹、毛澤東教育路線與劉鄧教育路線之衝突

中國大陸文教領域長期存在鬥爭，文革時期表現在意識形態的「紅」與「專」的路線鬥爭，或派系集團的毛派、劉派的權力鬥爭，因而學者習慣以對立二元論來分析中國大陸教育發展。Robert A. Scalapino 提出「革命化教育對現代化教育」、^③Jurgen Henze 提出「重質派」對「平等派」的分析模式。^④陳錫恩則以「白專模式」對「革命模式」，他預期鄧小平時代教育政策扭轉為現代化建設後，將重偏向「白專路線」，教育改革目的是強化學術方向。^⑤

毛澤東掌握中共軍、政、黨權後，陸續兼任中共黨校校長、紅軍大學政委、抗日軍政大學政委；^⑥中共建國後，毛想把大陸教育辦成「延安抗大」，即「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毛澤東上句話是強調政治，下句話是強調生產。從強調政治的上句話，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文化教育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觀念的反映，揭示了教育接受政治制約並為政治服務、為經濟服務；他甚早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他明確要求黨委書記要管教育，指示省、市、地、縣委第一書記要管教育，黨委書記不管教育是不允許的。^⑦

毛澤東主張的教育路線第一是強調政治、第二是強調生產，按照強調生產這句話的邏輯下：學制要縮短，並實施半工半讀制。他指示：「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做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形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⑧「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定參加勞動的合同；農村裡的中小學，都要和當地的農業社訂立合同，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日或者課餘時間回到本村參加勞動。」^⑨「大學和城市裡的中等學校，在可能的條件下，可以由幾個聯合建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⑩顯然大中小學都參加生產勞動，雖可節省教育經費，卻普遍降低教育水準，影響教育目標的達成。

註③ Robert A. Scalapino, "The Struggle over Higher Education Revolution Versus Development," Presented at the Fif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Taipei), June, 1976. pp. 8~11.

註④ Jurgen Henze, "Higher Educ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Quality," edited by Ruth Hayhoe,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4), pp. 93~153.

註⑤ Theodire His-en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pp. 121~170.

註⑥ 滕純主編，中國教育魂-從毛澤東教育思想到鄧小平教育理論（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67。

註⑦ 石佩臣、王少湘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載蔣偉杰、萬喜生主編，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教育思想（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9。

註⑧ 光明日報（北京），1974年1月22日，引自汪學文撰，「毛澤東教育思想之剖析」，載其所著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5年），頁240~241。



表一 毛澤東教育思想

時間	政策講話	教育思想
1936.6.8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話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
1950.6.6	〈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講話〉	「對知識份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1950.12.29	爲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題詞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
1952.6.4	批示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校學生負擔情況的報告〉	「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9.10 教育部根據批示發出指示：「將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爲公立學校，到 1956 年基本接收完畢。」
1955.12.27	在給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序言和按語	「技術夜校，每個鄉，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數的鄉，都應辦起來，…農民的學習技術，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由青年團負責一同管起來。技術學校的教職員，可以就地選拔，並且要提倡邊教邊學。」
1957.2.27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爲有社會主義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8.13	視察天津大學的講話	「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份子要勞動化。」「高等學校應抓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勞動結合起來。」
1958.9.9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	「現在要教育勞動相結合，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
1966.5.6	下達〈五七指示〉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資料來源：參考 1. 滕純主編，中國教育魂—從毛澤東教育思想到鄧小平教育理論（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六章；2. 汪學文撰「毛澤東教育思想之剖析」，載其所著，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頁 236~237。

中共建國以後教育路線的第一階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強調「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爲基礎，辦抗大式學校」；劉少奇則提出「全盤學習蘇聯」、「先搬後化」。實際推行教育政策的劉少奇，並未推行「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由於韓戰刺激必須一面倒向蘇聯，毛劉爭議乃息。毛澤東一九五二年起同意教育路線上「借助蘇聯經驗」，向蘇聯增派留學生，按蘇聯模式調整高等院校。⑨四月決定工科院校的調整計畫，七月決定農科院校、林科院校的調整，至九月完成 21 所綜合大學及 180

註⑨ 社論「積極實現全國學制調整方案」，人民日報（北京），1952 年 4 月 16 日，版 1。



所十類單科院校的調整，在調整中全部私立大學均改為公立；十月參考蘇聯教學計劃，制定工科各專業教學計劃，十一月師範科教學計劃也完成蘇聯化。^⑩一九五三年三月「教育部」指示各學校、各專業大力編輯、翻譯、修訂蘇聯教材、教學計劃與大綱。第一批翻譯、編譯好的39種俄文教材於六月出版。九月決策師範教育體系實施蘇聯化，十月發動全國教師「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大陸教育的蘇聯化改造逐漸完成。^⑪

第二階段（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主張培養「有社會主義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劉少奇主張培養「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兩人有培養目標之論爭。毛澤東明白地批示廢除幹部子弟學校：「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⑫然而劉鄧當局陽奉陰違，廢除幹部子弟學校後改為重點學校。

第三階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毛澤東主張建立「半工半讀制」，劉少奇主張「全日制」和「半工半讀制」並行，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布〈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在大陸建立了「全日制」、「半工半讀制」和「業餘學習」三類學校，然而中共把面子做給毛澤東，說他創造了「兩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堅持教育工作的群眾路線。

第四階段（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教育政策起了激烈衝突，毛派主張冒進和普及，劉派主張緩進和提高。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高等教育六十條〉，按劉少奇主張決定辦好一批全日制大中小學，培植一些「重點學校」，且從重點小學到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安排門類齊全。日後毛澤東發動文革反攻，批判「高教六十條」是教育戰線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

第五階段（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毛澤東主張改革教育制度，還很凸出改革學制、教材、教法。一九六四年他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說：「現行的學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學生讀了課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麼也不知道。四體不動，五穀不分。許多學生不知道什麼是馬牛羊雞犬豚，也分不出什麼是稻粱菽麥黍稷。學生要讀到二十幾歲才能讀完大學，學年太長了。課程太多，採用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啓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毛澤東還主張大學教育發給大學生正反兩面教材：「材料不只發一方面的，兩方面的（正反面）都要發。」不過毛的激進措施並未全實施，他自己承認「不贊成的多」。「所以我勸你們千萬不要迷信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要以為它都是好的。」^⑬

毛澤東在課程改革上突發奇想，他在春節座談會上說：「現在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劉少奇手下的「教育部長」陸定一就在中共中央文教小組會議上抗拒說：「課程砍一半，如何辦？必須小心謹慎，下邊自己去砍不好，不要亂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支持陸定一違抗毛澤東的「春節指示」，劉鄧阻止

註⑩ 劉光主編，新中國高等教育大事記（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7~40。

註⑪ 劉光主編，新中國高等教育大事記（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7~61。

註⑫ 毛澤東1952.6.14致周恩來信，載毛澤東著，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37。

註⑬ 孫喜亭撰，「關於毛澤東同志教育思想的研究」，教育研究，第9期（1982年），頁54。



「教育革命」，就迫使毛發動令教育倒退的文化大革命。^⑭

表二 文革教育改革以貫徹毛澤東的教育政策

教育路線	教育政策	教育實務	教育評估	參考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所以文化大革命著重政治教育和階級教育，把學校辦成「訓練班」和「批判組」，訓練學生為好鬥善鬥的「紅衛兵」。	全大陸大中小學，普遍停課停招生，原有學生「停課鬧革命」；從一九六六年起最激烈的四年文革中，有106所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遭到搬、併、遷、散的撤校命運；其中18所財經院校砍掉16所，又降1所為中等專業學校。	當紅衛兵，空置的學校校舍乃遭到機關、工廠及解放軍遷入，導致教具、圖書、儀器的散失，帶來耽誤一代人的教育培養。估計高等學校少培養一百多萬大學生，中等專業學校也少培養一百多萬中專學生，以致職工中具大專教育程度者僅占3%~5%，初中以下者占到70%~80%，還有5%左右文盲。	註解 ⑮、 註解 ⑯
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所以文化大革命著重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把學校辦成「勞動隊」和「生產組」，訓練學生為工農兵的「全能手」。	為了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也為了節約教育投資，教育部所屬二萬一千多所大專中學共辦起十五萬個各式各樣工廠、農村地區一萬四千多所學校也開辦了一萬零三百個農場。	中共令大中小學的老師和學生都參加生產勞動，以創造教育收益。訓練學生為「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能種田，拿起槍桿能殺敵，拿起筆桿能批判」，其結果是降低了高深知識的傳道授業解惑，毛式教育只造就一批工農兵。	註解 ⑰
教育由工人階級領導、結束知識份子統治學校	文化大革命安排工人宣傳隊要在城市學校、安排貧下中農宣傳隊在農村學校中領導學校。	文革末期撤走工宣隊、農宣隊或軍宣隊，並恢復校長制，但校長仍受學校黨委領導，毛澤東的理念是教育要接受政治權威的領導。	文化大革命安排工宣隊、農宣隊、軍宣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如此輕忽教育專業性的思想，在文革結束後受到中共唾棄。	註解 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註⑭ 毛派紅衛兵「北京市教育革命聯絡委員會」1967年5月6日出版教育革命第4期上撰「十七年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註⑮ 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編印，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內部發行，1967年12月），頁16。

註⑯ 朱開軒，「關於高校工作的若干問題」，載於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編，論中國高等教育（北京：北師大出版社，1987年），頁42~54、66~71。

註⑰ 袁振國著，教育改革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169~172。

註⑱ 彭迪光撰，「要重視高等財經教育」，載人民日報，1980.8.12，版4。



文化大革命十年，由於劉少奇已被鬥垮，毛澤東教育改革的主張全面推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軍委」和「中共文革」聯合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和堅決執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的通知〉，這份「根本指針」、「極其重要文件」，^①要旨如下：

一、「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所以文化大革命著重政治教育和階級教育，把學校辦成「訓練班」和「批判組」，訓練學生為好鬪善鬥的「紅衛兵」。

二、「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所以文化大革命著重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把學校辦成「勞動隊」和「生產組」，訓練學生為「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能種田，拿起槍桿能殺敵，拿起筆桿能批判」的「全能手」。

三、「實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結束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所以文化大革命安排工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文革末期撤走工宣隊、農宣隊或軍宣隊，並恢復校長制，但校長仍受學校黨委領導，毛澤東的理念是教育要接受政治權威的領導。

毛澤東輕忽專業教育的思想，在文革結束後受到中共唾棄。但是毛澤東「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觀點，一直延續到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的講話，受到天安門學生示威運動的刺激，鄧小平呼應強調「四項堅持」肯定左傾政治教條。鄧小平反對把「專」和「白」劃上等號，他說：「專並不等於紅，但是紅一定要專。」他表示又紅又專的統一觀點。在此政策下，「國家教委」副主任朱開軒指示學校教育兼顧政治和教育兩方面，「在重視業務質量的同時，也要強調政治質量」。^②中共政策路線在發展史上，長期受困於毛澤東模式和劉鄧模式的鬥爭，劉少奇已在文革中被紅衛兵鬥死，劉鄧模式若改以鄧小平模式表現，將之和毛澤東教育模式列表比較。

在前述劉少奇、鄧小平的教育思想，其實和傳統的教育倡導學術的學習並無二致，但是表二中毛澤東過度地著眼於教育為政治服務，提出教育路線的「紅」、「專」對立問題，教育模式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及一九七六年以後起了五次劇烈地震盪。從中共建國到一九五七年，大陸教育沿用學術模式而注入蘇聯教育內容，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給以猛烈地批評。但三面紅旗失敗，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於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掌握大局，對毛式改革煞車叫停。但是一九六六年起的文革十年，以社會為中心取代了學術為中心的教育革命，工農兵辦學代替了知識份子辦學，這一連串的教育革命實驗直至鄧小平復出結束文革乃止。^③

註① 王文友撰，「努力使教育事業走在前面」，載光明日報，1980.4.10，版4。

註② 光明日報（北京），1959.1.3報導，引自汪駿著，中共的文教改革（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民國76年），頁10。

註③ 姚文元撰，「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載紅旗雜誌第二期（1968年），引自汪學文撰「毛澤東教育思想之剖析」，載其所著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5年），頁251。



表三 毛、鄧教育模式之比較

項 目	毛澤東教育模式 (1966~1976)	鄧小平教育模式 (1976~1996)
國家目標	強調革命和共產主義，也注重生產和發展。	強調發展和現代化，也注重政治和意識形態。
培養目標	培養土專家、赤腳醫生、熱情的革命者、堅定的理論戰士和活動份子，紅比專重要。	培訓具有技能和技術的人才，獻身于無產階級事業和思想的受過訓練的專家、學者。紅、專並重。
學 術	正規、非正規和不正規的教育結合，開門辦學，學習素質低，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間強調普及，不強調素質。	學術是教育制度核心，全日制學習為主體，相互銜接學制的升學。培養英才而設重點大、中、小學。
課 程	校內外經驗的一致性和持續性，行動和書本知識一樣重要（或更重要）。政治思想教育是中心課程。生產、政治所需的知識和技巧，為當前服務的實際教育。	校內外學習和課外活動有別。各級學校要專注理論知識學習，重視高等學習的必要條件。教育為當前也為將來的需要服務。
方 法	社會即教育，學習在農場、工廠、街道和練兵場進行，參加生產和政治工作是學習的重要方法。	教育、圖書館和實驗室是集中學習的地方。書本學習是基礎，考試是促進學習的重要措施。
學習過程	特定的學習是為滿足生產和政治的實際需要。職務昇級建立在政治和生產成績的基礎上。	系統地學習是為進一步學習打好基礎和為將來需要做準備，有些知識和技能必須學習，職務昇級按學術標準。
領 導	強調共產黨領導，工農兵人員來擔任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知識份子的地位下降了。	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專業教師、教育家的積極作用。
思想指導	毛澤東思想刻板地按語錄、引文、指示辦事，嚴格地執行黨的路線，狹窄的思想。	靈活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根據現實條件理解他的教導，思想從僵硬的教條中解放出來。

資料來源：

1. 汪學文著，論析中共教育改革與四化建設之關係（台北：正中書局，民國75年），頁6~75。
2. Theodore His-en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pp. 121~170.
3. 劉勝驥撰「大陸高等教育之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36卷第11期（1993年11月），頁31~33。

貳、鄧小平推翻文革教改的教育政策內容

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第一步就是恢復文化大革命所破壞最嚴重的教育事業，因「文革」而癱瘓的「教育部」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恢復，周榮鑫新任「教育部長」。周榮鑫按照周恩來、鄧小平的反文革精神辦事，積極著手整頓教育工作。因為文革後期展開「批林批孔」運動，已經殘破的各級學校仍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勞動教育做為學習中心，文化課在學校沒有嚴格要求，師生紛紛「到大課堂去」、「進進出



出，上上下下」，學校秩序甚為混亂。

周榮鑫認同鄧小平理念，要改變學校中不重課業而重政治的風氣，卻遭到文革餘孽的反撲，一九七六年「教育部」在光明日報以「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的論文為名，批判張春橋「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之謬誤。中共主席華國鋒為調和兩派的衝突，改調劉西堯為新任的「教育部長」，劉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上任，而中共副主席鄧小平於八月四日至八日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會議時，劉即抵制鄧小平而轉向華國鋒的凡是派路線。^②鄧小平大刀闊斧地把凡是派的劉西堯免職，新任部長為務實派蔣南翔。

決心推翻文革教改的鄧小平即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召集「教育部」同仁做了〈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的講話，表示要將「工宣隊」、「軍隊支左」都毫無例外地撤出學校，人民大學要復校、師範教育要辦好、重點大學要抓起來、大學本科要定四年、醫科可以長一些、個別學科也可長一些、教學質量必須提高、教材改革從中小學就要抓起、且可以參考外國教材、加強學校教師隊伍、恢復教授、講師、助教等教師職稱……。^③

新崛起的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次「全國科技大會」閉幕式中，痛訴文革十年，受害最大最深的是青年一代，要彌補他們文化知識的損失，不是一個短時期能夠做到。中共中央委員陸定一在上海交通大學講話，指出將來會有一個時期，找不到知識份子，沒有工程師，沒有科學家，沒有教授和教師，沒有又紅又專的幹部。^④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派在這次中央委員會議中增選出3名務實派幹部進入政治局內，批判了華國鋒「兩個凡是」的觀點。^⑤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第二度復職後，重掌中共副總理的職位，主要在文教領域，從《鄧小平文選》中，我們可以發現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的五年間，鄧小平在各種場合談及教師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講話多達40餘次，充分說明鄧小平思想即發達文化教育策略的思想。

註② 所謂「凡是派」其理論主張為華國鋒所稱「凡是毛主席所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二報一刊共同社論。凡是其派系成員除華國鋒任黨主席兼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外，尚包括北京市市長吳德、政治局委員陳錫聯、汪東興等人。

註③ 鄧小平於197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後，恢復了其在1976年4月7日所撤銷之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等職。請參考鄧小平1977.9.19講話〈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引自翟葆奎主編，「中國教育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557~561。

註④ 光明日報，1980年3月4日，版2；及3月24日新華社電訊。

註⑤ 華國鋒與鄧小平都同意「四個現代化」的國家目標，但是在政策路線，華國鋒仍然秉持毛澤東的思想理念和政策措施，他領導的凡是派代表文革得利官僚和排除四人幫後的文革派；鄧小平領導的務實派則組織了文革受害老幹部。凡是派掌握了文化宣傳、特務與黨；而務實派掌握了軍隊，並在政府各部門都有支持者。

鄧小平在與文革派的權力鬥爭中第三次復出。聲勢又超過前次，他即積極在黨、政、軍各部門部署黨羽，加速為先前在文革中被整肅幹部調整解放，並採取「實踐檢驗真理」的文宣工作，將理論鬥爭的矛頭指向華國鋒主席的重要黨羽如吳德、汪東興和陳錫聯，指其應對壓制天安門請願事件負責。終於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派翦除了吳德、汪東興等人，鄧派取代了華派的領導權，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期間，開啓了長達二十年的鄧小平時代。^{②⑥}

鄧小平從現代化建設的角度來觀察和處理教育問題，他曾說：「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②⑦}這三句話揭舉了「科教興國」的建國藍圖，他認為大陸現代化的前途需要靠教育來引導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從而完成改革的國家目標。鄧小平要求「從戰略高度考慮教育問題」，「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年，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後果不堪設想。」^{②⑧}

鄧小平總結教育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決策下。面向現代化已如前述，要培養「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②⑨}來從事現代化建設的重任，並改變大陸科研人員少、隊伍小、比不上發達大國的落後面貌。^{③⑩}

教育面向未來的要求，則是把教育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加強教育預測、教育規劃、不斷改進教育體制、學校組織、教育課程和方法，以求教育理念適應未來國家發展的需求；其次，促進教育的社會化和個別化—即促進終身教育、回歸教育、成人教育等，滿足社會所有成員不斷豐富和更新自己，換言之即教育目標能使受教者不斷自我成長以迎合未來世界的需要。^{④⑪}

一、國民經濟計劃中重視教育計劃

由於深感教育的重要，鄧小平不但多次會議講話中作出對教育政策的指示，而且細心親自主持教育文件的擬定。他把國家計委、教育部和各部門合作協力，「使教育事業的計劃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教育結構依據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總目標，按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來調整教育系統，例如職業學校與普通高中的比例、招生數量都有所調整。^{④⑫}在早期大陸重視重工業專業，而開放改革後，輕工業發展迅速，這就需要相應增加工科院校和專業設置擴大招生。所以，不僅教育在為

註②⑥ 「鄧小平傳記」條，見國際關係中心主編，中共人名錄（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78年第3次重修），頁853。

註②⑦ 鄧小平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84~85、87、92。

註②⑧ 鄧小平著，鄧小平同志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174。

註②⑨ 這是鄧小平1983年10月為北京景山學校的題詞。

註③⑩ 鄧小平文選，頁110。

註④⑪ 滕純主編，鄧小平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354~55。

註④⑫ 劉勝驥撰「大陸職業技術教育之發展（上）」，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4期（1997年4月），頁42~60。



科技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而源源輸入各類科技人才，而且教育內部也保持一定的彈性，以適應經濟環境變遷和當代科學技術的突破。^③

二、增加教育經費

教育是開發智力資源的重要投資，教育投資是效能最大的投資。當鄧小平上台時，國家統計局調查教育文化系統職工，平均職工在國民經濟的12大行業中居倒數第一，處於最貧窮的地位，一般教師的待遇也得到些許提高，至少不能再位階十大職業之末，一九七七年十月大陸近6%教師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資；一九七八年學校教師首次領到年終獎金。鄧小平當政後就著手提高各級教職員工工資，使其工資所得名次向前擠進了一兩名。^④

整體的教育經費也在大幅提高中，教育事業費在一九七八年僅65億人民幣，一九七八年為102億元，一九八六年為214億元，一九八九年為320億元，一九九一年則達382億元，教育經費數額和其佔財政比重都有提高。^⑤

三、提高教師地位

文化大革命把教師關入牛棚，打成「臭老九」，不信任知識份子的這種昨日夢魘，在鄧小平時期總算完全扭轉過來。鄧小平平反教師的地位，增加教育事業的撥款，乃深切地了解追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先做到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其關鍵因素就是「深化教育改革，促進教育發展」。文革時期批判師道尊嚴的說法，一部湘劇電影「園丁之歌」因為歌頌了教師之愛而受到圍剿；文革受到打擊的成千上萬的教師都得到平反昭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也為800多名受迫害或錯劃為右派分子的科研人員恢復了名譽，鄧小平復出後，一九七七年就倡言：「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一九七八年他又進一步要求：「我們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表揚和鼓勵。」^⑥

鄧小平當權以後即努力增加教育預算和提高教師地位。鄧小平恢復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職銜，也建立中小學教師和高級教師的評定制度。一九八〇年春節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接見全國各級教師代表15,000人，確立了各地黨政領導在節日慰勞教師的活動；一九八五年宣布每年九月十日為教師節，還成立了教師獎勵

註③ 郭福昌等著，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簡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369～375。

註④ 郭福昌等著，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簡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75。

註⑤ 參見歷年中國教育成就統計數字；並見劉勝驥撰，「中共近十年來教育經費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1996年1月）第38卷第1期，頁8～9。

註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同志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5、28、65。



基金會，接著「教師法」、「教育法」、「教師資格條例」……相繼出爐，鄧小平在尊師重教、振興教育的努力有目共睹。

四、提高學術水準

恢復學術職稱，是甄別良莠、提高優秀者待遇和地位的辦法，科研中心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助理員的職稱先在一九七七年恢復，大專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職稱也在鄧小平建議下於一九七八年三月恢復。^⑦

鄧小平身兼主管文教部門的「副總理」，他命令「教育部」開始組織人力編寫中小學各科全國通用教材，以振興那些因為政治鬥爭而久荒學業的各級學校。^⑧

對於文化大革命所關閉的大專院校、所停頓的大專聯考……鄧小平要把被摧殘的高等教育恢復過來，他指示劉西堯：「人民大學是要辦的，主要培養財貿、經濟管理幹部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者。師範大學要辦好。」^⑨鄧小平又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學工作會議」中總結了二十八年來文科教育的正反兩方經驗，指出文科專業的設置和發展，「被撤銷的院、系、專業，凡有條件恢復的，要盡快恢復，被削弱的專業要創造條件充實加強，有些急需而缺門的專業要增設。」^⑩

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陸續創刊或恢復的學術刊物有 30 餘科，分支機構在 13 個省、區建立了次級單位和總共 83 個地方性研究所。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大陸各高等學校建立了 64 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245 個研究室，各地出版的社會科學刊物包括各校學報的社會科學版達 100 餘種，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較文革前大量增加。各省、市、區於一九七八年初恢復了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於一九七九年四月成立，隨後又成立一些教育科學專業研究會或學會。此外，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據一九八一年四月統計，全大陸範圍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會、學會已有 189 個，這說明人文與社會科學得到了蓬勃發展。^⑪

文革時期在江青集團領導下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四人幫」打倒後，鄧小平主張「堅持百家爭鳴方針，允許爭論，不同學派之間要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要提倡學術

註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同志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52、89。

註⑧ 1977年8月「教育部」開始從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引進大、中、小學的教材，以供國家重訂編寫教科書參考，9月份「教育部」開始組織人力編寫中小學各科全國通用教材。

註⑨ 10月12日「國務院」核定「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其中規定：考生應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省、市、自治區批准，考試分為文理兩類，錄取新生於1978年2月前入學。文革期間被撤銷的高等學校，如湖北財經學院、北京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陸續恢復。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同志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51~52。

註⑩ 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頁256、807。

註⑪ 1978年2月「五屆人大」所通過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宣布原隸屬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組為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並任命胡喬木為院長，下轄25個研究所，還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見宦鄉，「社會科學在中國」，中國百科年鑑198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年），頁431~433。



交流。」因而一九七八年通過的「五屆人大憲法」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字眼寫進了憲法序言，造成一九七九年開始，社會科學各種問題的討論空前活躍。^④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教育部」發出「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明確指出，在刊物上各門學科允許討論，對於學術問題提倡不同觀點、不同學派的自由爭鳴、不能把學術問題當成社會問題，也不能把政治問題當成敵我問題。允許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遺產（古為今用），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洋為中用）。^⑤

五、改革高等教育招生政策

高等學校招生入學在一九五〇年代保障名額給革命幹部、軍職人員，對於烈士子女、工農速成中學學員、產業工人則加分優待；一九五一年起高考報名作業設立「政治審查及健康檢查」兩道關口，目的在刻意排除舊社會勢力的後代：資本家、地主、富農及其他政治背景不良者的子女；十餘年下來大學教育主要招生為工農兵子弟及幹部家庭。文革初期高考考試制度廢除，多數大學也停止招生，一九七〇年後大學招生改採「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四步驟，廢考試而由工作單位或地方黨部推薦，因而許多來自工廠、農場、軍隊的青年獲推薦入學。^⑥此時期家庭背景成為影響個人進入大學就讀的關鍵因素。^⑦但是鄧小平上台以後政治考核、工作經驗的規定放鬆，一九八〇年以後大學入學標準完全視高考成绩而定。^⑧一九九〇年以大學高考從單一的公費招生擴展至「定向招生」與「自費招生」；舉辦單位由中央與地方兩類擴大到中央、地方、短期職業大學三類。^⑨由圖一看來整體中國大陸大學招生規模急速成長中。

註④ 由於鄧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放手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取代以馬列毛為真理標準，因而人文社會科學界才敢討論社會階級結構問題、民主與法則問題、政治體制問題、黨史問題、社會發展力等問題，在此學術自由氣氛下，各地區學界和高等院校舉辦了上百場的學術討論會。參閱劉勝驥撰，當代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之評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民國84年6月），頁2~21。

註⑤ 「教育部」還提出在學校教科書編寫上，鼓勵不同學派、不同學術見解的討論，提倡個人寫書，鼓勵自成一家之言。在此學術自由風氣下，新書寫成，新課也大膽開設，例如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開設了「資本論和新技術革命下的經濟理論」，西北大學開設了「現代西方哲學」、「現代西方經濟」和「現代西方文學」等課程。見宦鄉「社會科學在中國」，中國百科年鑑1980，頁433、429。

註⑥ Sobhe, K. "Education in Revolution: Is Iran Duplic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59, No. 2, pp. 271~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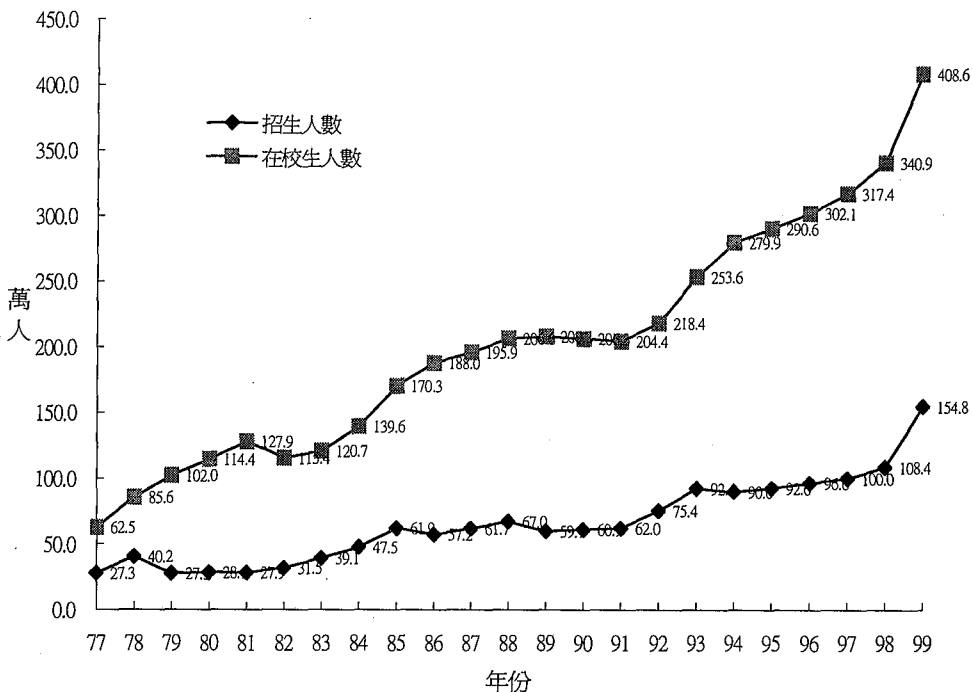
註⑦ Hawkins, J. N.,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 Y: Praeger, Publishers, 1983), pp. 8~11.

註⑧ Shirk, S. L., *Competitive Comra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註⑨ 周祝瑛著，大陸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兼論臺灣相關課題（台北：師大書苑，民國88年），頁28。



圖 一



資料來源：整理自一九九八年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九年中國統計年鑑。

再看大陸高校錄取學生之背景，從（表四）所見文革高潮時期上大學 95 % 為工農兵和幹部子弟權利，當文革尾聲仍高居 84 %；但是文革結束和鄧小平復出，工農兵和幹部子弟上大學立刻銳減為 57 %，知識份子子弟上大學遞補了這空出來的 43 %。個別學校的研究也符合這一發現，吉林大學四個班級在鄧小平逐漸掌權的頭四年，知識份子子弟由 5 % 上升至 15 %，幹部子弟由 18 % 下降為 15 %，工人子弟由 11 % 下降為 6 %，農民子弟由 7 % 下降為 2 %，凸顯高考制度實施後，工農兵子弟上大學立刻銳減的事實。◎毛澤東時代強調「階級教育路線」，保障工農兵子弟優先上大學以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政策，在鄧小平時代就被擇優錄取的「精英教育路線」給取代了。

表四 大陸高校錄取學生之背景

家庭背景	1971	1975	1978
工農兵、幹部子弟	95 %	84 %	57 %
知識份子子弟	0.9 %	15 %	43 %
其他	4.1 %	1 %	0

資料來源：Broaded, C. M.,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Changes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83), p. 131.

註◎ Pepper, S., *China's Universitie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1984), p. 46.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九九年間，中國大陸研究生人數之消長變化，大致與高校人數之增減成正比，即研究教育與高等教育同步發展。詳如（表五）所列：

表五 研究生人數增長表

年份	在學人數	招生數	畢業生數
1952	2,763	1,785	627
1957	3,178	334	1,723
1962	6,130	1,287	1,019
1965	4,546	1,456	1,665
1978	10,934	10,708	9
1979	18,830	8,110	140
1980	21,604	3,616	476
1981	18,848	9,363	11,669
1982	25,847	11,080	4,058
1983	37,166	15,642	4,497
1984	57,566	23,181	2,756
1985	87,331	46,871	17,004
1986	110,371	41,310	16,950
1987	120,191	39,017	27,603
1988	112,776	35,645	40,838
1989	101,339	28,569	37,232
1990	93,018	29,469	35,440
1991	88,128	29,679	32,537
1992	94,164	33,439	25,692
1993	106,771	42,145	28,214
1994	127,935	50,864	28,047
1995	145,443	51,053	31,877
1996	162,322	59,398	39,652
1997	163,209	59,279	43,267
1998	198,885	72,508	47,077
1999	233,513	92,225	54,670

資料來源：1. 一九九八年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2. 一九九九年中國統計年鑑。



六、發展重點高等學校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在「教育部」聽取工作匯報後說：「要抓一批重點大學。重點大學既是辦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八月他又提了：「重點大學應該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這點應該定下來。」原本毛澤東表示反對的重點學校，經鄧小平一再鼓吹後，一九七八年二月「國務院」轉發下〈教育部關於恢復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報告〉，恢復過去遭取消名義的 60 所重點大學，更增加至 88 所重點大學，給予較高的教育經費，鞏固其現有師資、設備、校舍等條件，以求重點大學提高高教水準，並開展科研工作。進入八〇年代重點大學的建設更得到進一步重視，在系科和專業方面給予足夠發展經費、給予精密貴重儀器和重大設備的進口、給予充實圖書和建設文獻情報中心，使其得到門類比較齊全、並擁有眾多績優教授和研究生的優勢。

一九八九年「國家教委」又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近一億美元，對重點大學的重點學科建設，共裝備了 58 個重點實驗室和 57 個專業實驗室。「國家教委」在高等學校 1,501 個有博士學位的授予權的學科點中，擇優選擇了 417 個重點學科點（文科 78 個、理科 86 個、工科 164 個、醫科 53 個、農科 36 個等），給以承擔各層次的研究任務和科研課題費，重點學科發展所需的人員編制，在強化優化結構、人員精幹的前提下，優先給予支持。^④

七、建立學位制度與培養研究生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高層次專門人才在各行各業各領域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一九八〇年經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這也是第一個經人大常委會批准發布的國家教育法律、法規。一九八一年大陸實行學位制度，「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即起召開學科評議組會議，審定了博士和碩士學位授與單位和專業點，一九八二年起三年全大陸共招收博士學位研究生 2,939 人，已授與博士學位 121 人；共招收碩士學位研究生 25,685 人，已授與碩士學位 11,268 人。^⑤

大陸研究教育快速成長，至一九八七年歷年共招收研究生 16 萬 6 千人，其中博士班 7 千多人；共畢業研究生 5 萬 1 千人，其中博士班 7 百多人；全大陸已有 400 多個學科、專業，1,800 多個專業點可以培養博士生，1,800 多個學科、專業，6,000 多個專業點可以培養碩士生，研究生的教育也逐步制度化，素質和績效日益提高。^⑥至一

註④ 郭福昌等著，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簡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10～215。

註⑤ 「教育部」辦公廳直屬機關黨委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的中國教育二十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141。

註⑥ 吳本廈撰，「關於研究生教育發展和改革幾個問題的探討」、潘懋元撰，「高層次專門人才的培養與研究生制度的改革」，分載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編論中國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7 年），頁 100～103。



九九六年 418 所高校和 319 所科研機構招考碩士班研究生 4.16 萬人，當年報考碩士班的大學畢業生達 20.4 萬人，兩成的低錄取率凸顯大陸新近流行了「考研熱」。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充實了企業、科研、政府對高級專門人才的需求，還有力地促進高等學校重點學科的建設。

八、擴大學術交流與留學政策

對外開放需外語人才，一九七八年八月的「全國外語教學座談會」為「教育部」所召開，希望提高外語教學質量，為求切實抓好中小學外語教學，當局決定集中精力辦好一批重點外語院校，編寫出版一批英、日、德、法、俄語教材。一九七九年三月「教育部」發出「加強外語教育的意見」；七月「教育部」和「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聯合決定以後三年聘請一批外籍教師來華任教，每半年一期培訓班，6 期外語班輪流培訓了大專院校外語師資的半數。^②同年「教育部」也決定在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工學院、武漢大學、華南工學院、重慶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籌建九個外國教材中心圖書館，以加強外國教材的引進、管理和使用。^③

教育面向世界，則打破中國傳統教育的閉關自守的狹隘性與封閉性，發展與世界各國的教育交流，早在尼克森在與中共協定的上海公報中已有承諾。^④鄧小平既主張「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我國講學」，也主張「派人出國留學」。^⑤卡特總統代表 Frank Press 所傳來的喜訊，中國大陸可以派遣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前往美國學習科技。但是為了科技生根，鑽研基礎科學，是否可以派出大學生、研究生，開放留學政策，進一步和擴大派遣留學人員呢？鄧小平主張派遣留學生，待其學成歸國後才能整體地提昇大陸的高等教育的素質。^⑥

中共教育改革會議上，一般學者專家普遍支持鄧小平的主張，試分析當時中國大陸學術界領導階層，中國科學院正副院長 7 人中有 6 人是拿外國學位的，該院設在北京的 39 個研究所的 205 名正副所長中，有 61 人是留學海外歸來的知識份子，留學生擔任中國大陸高等院校校長更超過 30%，他們傾向留學政策早日恢復實行，以免高

註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1（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667~673。

註③ China Exchange News, Vol. 6 (June/ August 1978), pp. 3~ 4. 另參閱新聞「出國留學人員工作會議研究今後選派重點」，人民日報 1984 年 11 月 10 日，版 4。

註④ 1972 年 2 月 28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與中共協定的上海公報中，承諾「兩國人民要在科學和技術領域中，加深相互的了解和合作」，1978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卡特總統科學顧問美國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 Frank Press 博士奉命到中國大陸，討論科學技術交換事宜。See China Exchange News (June/ August 1978), Vol. 6, pp. 3~4.

註⑤ 鄧小平著，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54。

註⑥ 1978 年 3 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要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關係。」確立了對外開放政策，「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中國人民大學 30 週年校慶上主張大學教育要引導學校「既要深入體察國情，又要密切注視世界潮流」，引自鄧小平著，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88。



級科技人才的斷層和大專教學師資人才的青黃不接。^⑦鄧小平剴切地在政治局內會議中，表示「抓文教抓科技」唯有派出留學生，才能解決科技低落和人才不足的危機。中共政治局在表決之後，作出了一個「擴大派遣留學人員的重要決定」，標誌了由周恩來到鄧小平的務實派政策終獲勝利。^⑧

一九七八年中共留學政策也由中央全會正式通過而確定。是年底，「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共向 28 個國家派出 480 多名留學人員，其中 50 人留學美國，多數學習自然科學。爲了確保留學政策的實施奏效，鄧小平將方毅改調爲「中國科學院」院長，蔣南翔改調爲「教育部長」。^⑨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共「副總理」鄧小平率領方毅、蔣南翔等人應邀訪美，焦點之一就是兌現中共留學政策。蔣南翔以中共「教育部長」身份和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 Joseph A. Califano, Jr.，簽署了雙方教育交換協定（Agreement on Education Exchange Programs），在十一點協定中除了雙方互派留學人員包括交換教授、研究員和留學生外，也互換教科書、教學資料、語言教學和合作研究計畫。^⑩

鄧小平打開了對美交流的門口，在（表六）中，中國大陸向西方各國派遣留學人員迅速成長，至一九八一年已向 46 個國家派遣了五千多人留學，本年也接受了兩千名來華學生和教授專家，對中國大陸的科學技術現代化起了決定性作用。

表六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大陸的國際學術交流

比較	中共派出人員	大陸接受留華人員
人數成長	1978 年向 32 國派 1,548 人留學 1979 年向 41 國派 2,700 人留學 1980 年向 45 國派 5,100 人留學 1981 年向 46 國派 5,609 人留學	1973 至 1978 接受 80 國 2,498 人留華 1979 接受各國 576 人留華 1980 接受各國 749 人留華 1981 接受 82 國 2,000 人留華
分佈性質	分析三年來教育部所派出 7,683 名留學生的留學科系 學社會科學占 3.6 % 學外國語言占 15.4 % 學自然科學占 81 %	兩千留華學生分布 43 所高校的 52 個專業，據 37 所高校的 110 個專業點，計文科占 33 個、工科和農科占 50 個、醫藥 9 個、藝術 19 個。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年鑑 1949~1981，頁 667~671。

中共與西方國家，發展學術、科技、經濟、工業等方面的交流關係，進展快速。一九八四年，中共與 85 個國際性科學技術組織，簽定了 51 項協定，個別國家除與美國簽有 22 項協定，中共還與西德有 31 項協定，中共與法國有 25 項協定，與英國有 13 項協定，中共與義大利有 17 項協定。透過這些協定，中共可以向西方購買先進科

註⑦ 劉勝驥著，大陸海外留學生面面觀（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 82 年），頁 45~57。

註⑧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514。

註⑨ 劉勝驥著，大陸海外留學生面面觀（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 82 年），頁 52。

註⑩ *China Exchange News*, Vol. 7, No. 3 (June 1979), p. 4.



技設備、邀請專家來華指導和派遣留學生赴西方學習。⑤中共快速地輸入現代化科技，這項政策方面的成就非凡。截至一九九七年統計二十年來大陸共派遣 30 萬各類留學人員，其中國家派遣 4.7 萬人，單位公派 9.2 萬人，自費留學生 15.4 萬人，分布在 103 個國家和地區。⑥

九、加強馬列教育和軍訓

中共採行開放政策後，爲了抵禦西方資本主義傳播大陸帶來「變天思想」，一九七九年規定理、工、農、醫各院和外文科系必須修 10 % 總學時的政治理論課程，文學院其他科系則提升至 20 %。一九八〇年「教育部」再頒布〈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馬列主義課程的試行辦法〉，規定大專院校各院科系一律開設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唯物主義，每門課不少於 70 節課，文學院則加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科學社會主義，每門不少於 105 學時；三專開二、三門課；二專開一、二門課。⑦清華大學爲了培訓政治課老師，還在理工科系學生挑選 19 名畢業生，教授正規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儲訓一至三年後提升爲政治教師。清大校長高景德表示：從學生中培訓思想政治幹部較易「和同學們打成一片」，「要把大學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堅強陣地，必須重視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⑧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提高大專院校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教學時數，由原總學時的 14 % 提高到 20 %；新課程也開設不少，華東師大新開「中國革命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資本論選讀」、「毛澤東哲學思想」、「馬列著作選讀」八門課。⑨

高等學校開設軍訓課程也能達到加強政治教育作用，中共早先於五〇～六〇年代試在一些高校與高中開展軍事訓練。一九八五年「教育部」、「總參謀部」等六中央部門聯合發出〈關於高等學校、高級中學進行軍事訓練試點問題的通知〉，在 50 所高校與 100 所高中的一、二年級開展軍事訓練。⑩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李鵬下令強制軍訓和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北大新生連續兩年送往軍營實施一年軍訓和馬列主義，授課時數由原總學時的 14 % 提高到 20 %，北大新生要變相五年畢業後，報考人數減少，錄取分數下降，北大校方和教授都激烈反彈，後來當局終於縮短北大新生軍訓爲一個月。至於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所開出課程學生不願選修，強迫修也出現翹課抵制，終於中國人民大學決定取消 17 門馬列教育課程，並新開 14 門與市場經濟有關新課。由於學黨義懂馬列的人才，早已飽和過剩難找出路，加以中共持續展開改革事

註⑤ *China Exchange News*, Vol. 13, No. 1 (March 1985), pp. 27~28.

註⑥ 「教育部」辦公廳直屬機關黨委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的中國教育二十年，前引書，頁 315。

註⑦ 光明日報，1979年3月12日，版3。

註⑧ 高景德撰，「努力堅持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編，論中國高等教育（北京：北師大出版社，1987年），頁 72~77。

註⑨ 陳鉉寶撰，「加強課程建設，促進教學改革」，中國高等教育（北京），第1期（1992年1月），頁 72~77。

註⑩ 金一鳴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 288。



業，學生寧修市場經濟而不修馬列。^⑥

叁、江澤民的教育政策

六四天安門血腥事件之後，罷黜趙紫陽而擢升江澤民，鄧小平連中共軍委主席也辭退交付江澤民，然而「鄧辦（鄧小平辦公室）」仍隱身幕後繼續審閱中共文件。江澤民受鄧小平栽培，又試圖攏絡保守派而對經濟過熱和嚴重的腐敗現象及意識形態的親西方現象加以壓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警惕江澤民勿將政策轉左，他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⑦江澤民隨後表態堅定支持改革開放路線，而且發動了學習鄧小平思想的理論運動，編纂出版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標誌鄧小平路線在鄧小平死後的延續。

尤其在鄧小平有關教育的政策方面，中共在十二大和十三大都把教育列為戰略重點決策，標誌著中共對社會主義建設與教育關係的認識上，做了一定程度的飛躍。一九八九年九月江澤民在中共建國四十周年集會中講話，指出「發展教育和科學是百年大計，對於社會生產力和民族素質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全面總結了十年來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要求各級領導認真辦教育，「像鄧小平同志希望的那樣，扎扎實實地抓它幾年，中華民族教育事業空前繁榮的新局面，一定會到來。」^⑧

中共十四大上，李鵬和江澤民都在大會報告中指出「我們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會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⑨江澤民又提到「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發展戰略」，「小平同志反覆強調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⑩

中共第十五屆黨代表大會和第九屆「全國人大」在鄧小平逝世後舉行，中共各領導都表示「繼續沿著鄧小平同志指引的道路開拓前進」、「推進科教興國戰略」。^⑪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下，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載入黨章，二十年來中共持續地推動學習鄧小平思想的理論學習運動，關於鄧小平言論文集的研究論文出版了數十種之多，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核心，仍然高舉著鄧小平旗幟作為其政策路線，江澤民「科教興國」

註⑥ 黃寬裕撰，「『六四』以後中共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民國82年），頁102~103、205、309、333~335。

註⑦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83頁。

註⑧ 張樹人撰，「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載國家教育發展中心編，中國教育發展的客觀背景現狀與展望（北京：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頁3。

註⑨ 李鵬講話，「動員起來，為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而努力』」，載人民日報，1994年6月21日，版1。

註⑩ 江澤民講話，「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94年6月20日，版1。

註⑪ 溫家寶講話，「在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表20周年紀念會講話」，載湖南日報，1998年3月22日，版4；李鵬講話，「在九屆全國人大上政府工作報告」，載湖南日報，1998年3月21日，版2。



的決策，即落實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⑳

教育部門學習鄧小平教育思想的運動更見擴大的趨勢，一九九四年「國家教委」已經成立「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正組織起草「鄧小平教育思想學習綱要」，推動大陸高等院校和整個教育行政部門對鄧小平教育理論的學習。至今推廣鄧小平思想教育的五年經驗中，中共持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性，認為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理論基礎，是當前和今後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思想武器。」^㉑

基本上江澤民時期的教育政策是持續了鄧小平的教育理念，其想法和作法基本上相同，有其延續性。吾人所關切有興趣者為江澤民政策曾在那些措施上修正了鄧小平政策，看當前中共最新政策的走向，並體會鄧小平教育思想被繼承和發揚的其餘內容。

本節僅就培養目標、政治思想、教育結構、教育質量、教育經費、民辦學校等六方面來看江澤民的教育政策所作的微幅變遷：

一、教育培養目標

鄧小平一九八〇年起多次提出培養「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一代。一九八三年四月鄧小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思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口號，這個思想即成爲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重要依據：「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而且鄧小平在「四有」中特別強調有理想和有紀律兩項。^㉒

但是「四有新人」到了江澤民時期就比較少提到，中共十四大以後提出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對於義務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都有培養目標的描述，但都沒有從理想層面來提「四有」口號，而是有區別的提出「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的具體目標」。^㉓

雖然鄧小平的「四有新人」理論已經是大陸教育界的基本共識，例如北京師範大學成有信教授就撰文結論，認為中共教育目標是「培養高科技和高人文素養的、具有主體人格和創造精神的有理想、有道德遵紀守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優秀公民。」^㉔不過，江澤民正以「四個統一」來取代鄧小平的「四有」，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的慶祝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江澤民提出：（一）學習科學文化與加強思想修養的統一；（二）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統一；（三）實現自身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四）樹立遠大理想與進行艱苦奮鬥的統一。這「四個統一」的內涵與「四有」其

註⑳ 江澤民講話，「努力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引自論科學技術（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48。

註㉑ 朱開軒講話，「在國家教委1998年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大陸國家教育委員會政報1998年第1、2號，頁4~5。

註㉒ 鄧小平講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00。

註㉓ 中共中央制定，「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載中共新華社稿，1993年2月26日，版1。

註㉔ 成有信撰，「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發展與現代教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3月，頁32。



實沒有什麼實質差異，大陸教育學者還解釋「『四個統一』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培養『四有新人』」。②江澤民要打出自己的旗幟以取代鄧小平旗號的動機昭然若現。

二、政治思想教育

鄧小平時期非常重視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學校應該永遠把堅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提醒全黨，國家大政方針轉移到經濟建設以後，要防止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的傾向；他所強調的政治思想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③所以，鄧小平要求全黨遵守「四個堅持」並防範西方文明的精神污染，認為年輕人流行的社會思想會導致社會動亂，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危害的嚴重性」，要求「切實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長期堅持下去，保證教育事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④

當前江澤民時期對政治思想的重視不若鄧小平時期，而且更重要的是四項堅持只剩下一項堅持：遍查八〇年代所通過的「義務教育法」和「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九〇年代通過的「學位法」、「教師法」和「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等，都只有堅持社會主義而已。例如「教師法」第一條「促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發展」，第三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⑤都不再強調人民民主專政、中共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等三項極左教條，鑑於社會主義的內涵寬廣，可以與當前歐美主流思想甚至和三民主義價值或民主進步黨的福利國家相融合，所以在江澤民時期已經軟化了鄧小平的左傾政治思想路線。

三、教育結構變遷

鄧小平非常重視經濟與教育、科技、衛生、體育之間應有一個合理比例，一九八〇年他就提出經濟發展與教育科技發展比例失調問題，他的結構調整著眼於整個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鄧小平要求調整中等教育結構，為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職工學校的比例；他又要求制定教育計劃，要與勞動計劃結合起來，切實考慮就業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不僅要看到近期需求，而且必須預見遠期的需要。⑥

江澤民時期大陸職業中學的擴張又由高速成長趨緩，普通高中數量反而增加，這種由高等教育擴張後所帶動高中生源的需求，如此調整是符合鄧小平教育政策的。高

註② 周如東撰，「論『四個統一』思想的理論基石」，載中國教育報（北京），1998年7月22日，版3。

註③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程敏主編，中國共產黨黨員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46～47。

註④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16。

註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引自楊開煌編，台海兩岸（台北：中國大陸研究學會），夏季號（1994年6月），頁111。

註⑥ 張樹人，前引書，頁7。



等教育中調整專業設置、新設系所和院校、發展廣播電視教學……這些迎合市場經濟發展下的教育改革，也都符合鄧小平調整教育結構的宗旨。不過也有些教育調整程度遠出於鄧小平政策本意，例如教育系統一貫由「黨委治校」轉移為「校長治校」、為彌補教育經費之不足而坐視民辦學校、合資辦學的興起……使得黨對教育事業的掌控以及政治思想灌輸的衰落，如此便遠離了鄧小平調整教育結構的初衷了。

四、教育品質政策

大陸名詞中「質量」事實上是單指品質的意思而已，鄧小平早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提出主要的任務，就是提高教育質量，「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育的質量，按照中小學生能夠接受的程度，用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充實中小學的教學內容。」^⑤當時中共就恢復了文革停止辦理的重點小學、重點中學，中共集中經費和師資，來加強重點學校的建設。鄧小平接著又要求辦理一批重點大學，「盡快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作為科學、教育戰線的重要任務。」^⑥「只有有了成批的傑出人才，才能帶動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⑦

江澤民時期高等教育還在徵選重點大學，「國家教委」自一九九三年起提出「211工程」口號，即在二十一世紀一百所重點大學。^⑧但是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在普及義務教育的新口號下被冷凍起來，而且「國家教委」以加強薄弱學校建設來作為其一九九八年第五項主要工作。^⑨鄧小平的重點提昇教育品質的作法，在江澤民時期重點大學還辦理，但重點初中、重點小學就不准辦理了。

中共不搞中小學的重點學校，轉而建設薄弱學校，是爲了拉平城市與鄉村間，甚至同一地區間教育資源的不平衡。而且所謂重點中小學，其名聲的獲得爲其高升學率，如此一來便導致了不良的升學競爭，而且扭曲教育宗旨爲應試教育。目前教育界經廣泛討論後，「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也作了表態，因而「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已經申明：「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⑩所以，鄧小平提高教育質量的政策考慮，原本是偏重智育方面，而到了當前中共義務教育階段，轉向同時提昇德育、體育、美育，補充青少年實踐和動手能力，追求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⑪

註⑤ 鄧小平文選，前引書，頁100~101。

註⑥ 鄧小平文選，前引書，頁93。

註⑦ 「211」的21爲廿一世紀，第二個1爲一百所重點大學。「211工程」資料參見：周川，「『211工程』—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工程」，教育研究（北京），1994年第1期，頁34；淑芳，「『211工程』理論問題研討會綜述」，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頁39。

註⑧ 「國家教委1998年工作要點」，國家教育委員會政報（北京：國家教委，1998年），頁20。

註⑨ 中共中央「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載「國家教委」政策法規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教育現行法規匯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

註⑩ 李嵐清撰，「基礎教育是提高國民素質和培養跨世紀人才奠基工程」，人民教育（北京），1996年第5期，頁3。



五、教育經費政策

開放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以極大努力來增加教育投入，國家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從一九七八年的7.7%提高到一九八八年的12.18%，絕對數從76億提高到321億人民幣，成長3.2倍和年平均成長率為15%。但是由於原有教育經費基數偏低，且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GNP）到一九八八年反而下降到2.47%，此時期（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全世界的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5.8%，其中已開發國家為6.2%，開發中國家為4%，中國大陸為2.7%。^⑧大陸在GNP超過300美元以後，理論上國家投資教育應超過4%的GNP比重，如今不但遠低於發達國家，由（表七）數據大陸的教育投資連開發中國家都不如。

表七 各國教育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比較

（單位：百分比）

年份	世界平均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亞洲	臺灣	大陸
1960	3.6	3.7	2.3	2.9	2.22	
1965	4.8	5.1	2.8	3.2	2.42	
1970	5.4	5.7	3.3	3.5	3.46	
1975	5.7	6.0	3.9	4.8	3.08	
1980	5.7	6.1	4.0	5.0	3.55	
1981	5.7	6.1	4.1	5.0	3.69	2.74
1983	5.7	6.1	4.0	4.6	4.62	2.84
1984	5.7	6.1	4.0	4.6	3.97	2.78
1985	5.8	6.2	4.0	4.7	4.10	2.70
1986					4.21	2.82
1987					3.80	2.51

資料來源：

1. 宋繼主編，中國年鑑（一九八九）（北京：中國年鑑編輯部，1989年），頁415。
2. 袁連生，「論我國教育經費的匱缺」，教育研究（北京），第7期（1988年7月），頁24。
3. 王善邁，教育投資與財務改革（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頁11。
4. 中華民國師大教研中心主編，教育統計資料（1）（台北：師大書苑，民國81年），頁9。

江澤民時期空有「科教興國」口號，各級政府仍然經濟掛帥，為經濟發展速度發愁，蓋辦公樓勁頭很大，教育意識淡薄。在偏愛經濟的決策路線下，甚至把學校用地占了，把好教師調走了，甚至把教育經費挪用了。一九八七年的工資改革使工業系統

註^⑧ 郭福昌等著，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簡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5～26。



工人的津貼、獎金，已超過教師的收入，一九九一年教師收入降至第十，為十二大行業之後者。^⑩教師經濟地位與收入，與其所受教育與學歷不成正比。省市地方遇有財政拮据，則往往削減教師的福利和津貼，重慶不發給每月65元的菜籃子津貼，更有省市拖欠教師的工資合計達八千萬人民幣。^⑪一九九二年大陸全國共有21.6萬中小學教師調出、辭職、轉業，占總數2.4%；一九九二年上海流失2,000名教師，一九九三年流失數上升為2,292名教師；廣東從一九八七年起每年流失逾2,000名教師，一九九二年上海流失6,200名教師，所流失者多為40歲以下學歷合格優秀教師，越是經濟開發城市越無法留住人才耕耘教育。^⑫一九九三年二月中共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將教育經費由原本以國家撥款為主的制度，轉移為國家撥款、地方財政撥款、城鄉教育費附加、企業投資和捐贈、社會集資和捐贈、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籌措教育費用」，雖然對教育經費有「三個增長」的規定，^⑬然而實際增長有限，多年來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僅占國家財政支出的5.9%~11.6%，也僅相當中國大陸GNP的2.51%~2.84%。^⑭

六、開放民辦學校政策

鄧小平的多渠道寬籌教育經費，發展到江澤民多渠道設立各級學校，是面對民間社會不滿足於捐贈興學，而要集資辦學的慈善加企業的心態。九〇年代政府頒布有關「社會力量辦學」規章和法令完善後，據一九九三年統計：全大陸已有民辦幼稚園16,990所、民辦小學7,030所、民辦初中555所、民辦高中296所，義務教育體系容納了數十萬青少年及兒童。另據一九九五年統計：全大陸經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批設立、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等學校已有18所，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更達800所，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畢業生或結業生。此外民辦職業中學200餘所、民辦中等專科學校100所，另有各類短期培訓、補習、輔導和社會文化生活教育的民辦機構3萬餘所。總計大陸經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批准設立的民辦教育機構約6萬餘所。

不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等學校視同成人教育，要通過「自學考試」及格才能取得等同大學畢業的學歷認證，這與廣播電視大學的學歷認證相同。據一九九七年統計：全大陸廣播電視大學在校生70萬人、畢業生231萬人，相當同期高校畢業生14%。廣播電視中專在校生40萬人、畢業生也累積達100多萬人，此外各類非

註⑩ 張詩亞、周誼著，中國教育戰略重點問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42中舉出兩例證：一鐵路中學中年教師改行坐辦公室，工作輕鬆三分之二，月薪增加二百元；另一骨幹教師放棄升校長機會而轉業爭取高經濟收入。

註⑪ 新華文摘（北京），1994年第4期，頁155。

註⑫ 新華文摘（北京），1994年第4期，頁154。

註⑬ 教育經費的「三個增長」按1993年2月中共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係：1. 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內撥款的增長、2. 各級教育預算內事業費支出的增長、3. 各級教育生均預算的增長，載人民日報，1994年2月31日，版3。

註⑭ 參閱劉勝驥著，大陸地區二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研究的政策面研究（台北：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報告，民國82年），頁169表一、171表二。



學歷教育結業生 3,000 多萬人，並為千萬計農民提供了農村實用技術培訓。^⑤中共教育經費拮据，不能興建全國校舍，卻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統籌規劃、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遠距離教育系統。再加上民間自發的民辦教育系統，相當程度地擴大了整體教育容量。

肆、結論：大陸教育發展評估

一、教育經費投入不足

大陸投入教育經費長期不足，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2.7%，遠低於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窮國辦大教育表現了四項特徵：

- (一)勞動人口文化素質較低；經濟部門職工以初中和初中以下最多，4,000 萬技術工人 70% 評級在三級以下。
- (二)教育質量有待提高；小學入學率雖然已達 98%，但中輟生流失率很高。初中入學率不到 70%，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廣西、貴州、雲南、西藏九省區的教育水準堪虞。
- (三)辦學條件不足；農村中小學多數沒有實驗室、圖書館，教師隊伍因待遇偏低而不夠穩定。高等學校也有人才流失問題，高校改採高學費政策，使清寒子弟上大學大成問題。
- (四)高級人才流失；二十年來公費留學人員 14 萬人，回國了 9 萬多人；15.4 萬自費留學生，僅 6 千多人回國。此外大學教授、中學骨幹教師、小學特級教師調出學校或投入機關、企業者衆，說明教師微薄的新津實在有待提高。

二、義務教育發展良好

一九四九年以前全大陸僅有 1,301 所幼稚園、入園兒童 13 萬人，小學 28.93 萬所、在校小學生 2,368.3 萬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僅約 20%。不過國民黨政府留下了 610 所中等師範學校和 15 萬師範畢業生，發展到一九八四年的 1,008 所中等師範學校、51 萬師範生，共積累了 341 萬名小學和幼稚園師資，竟能將學齡兒童就學率拉拔到九成。^⑥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發展到 17.5 萬所幼稚園、入園兒童 1,531 萬人，小學 149 萬所、在校小學生 32,093 萬人，學齡兒童就學率約 98%。

一九九三年大陸教育提出「兩基」口號：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兩項教育目標。至一九九九年「兩基」的覆蓋率已達到 73%，中共教育部規劃到二〇一〇年要求 95% 以上人口普及義務教育和掃除文盲。然而有些貧窮和偏遠省份，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拖欠教師工資，初中輟學率居高不下，隨著初中學齡人口高

註⑤ 「教育部」辦公廳直屬機關黨委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的中國教育二十年，頁 457。

註⑥ 劉潤岫著，當代中國師範教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59。



峰的來到，「兩基」指標反而有下滑的壓力。

九年制義務教育涵蓋了初中免試升學，這給予大陸教育界嘗試以「素質教育」取代「應試教育」，單純的智育分數不再是評鑑學童和學校的標準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教育要把德、智、體、美、勞五育均衡，過去以升學率標榜出來重點小學和重點初中不再強調，相反的要將師資和物質資源平均拉拔各校。

基礎教育的近年蓬勃成長，初中小學共有教師一千萬人，形成大陸社會基層的安定力量。教育經費至一九九一年為七百多億人民幣、一九九四年為一千四百多億人民幣、一九九七年為兩千五百多億人民幣，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而每三年翻了一番。繼續增加政府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已感拮据，政府立法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形成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榮局。不過民辦學校未在貧窮落後缺乏教育資源的省縣出現，它反而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出現且多為貴族學校，這些私立學校以英語、電腦及升學率來爭取學生付高學費入學。

三、高等教育發展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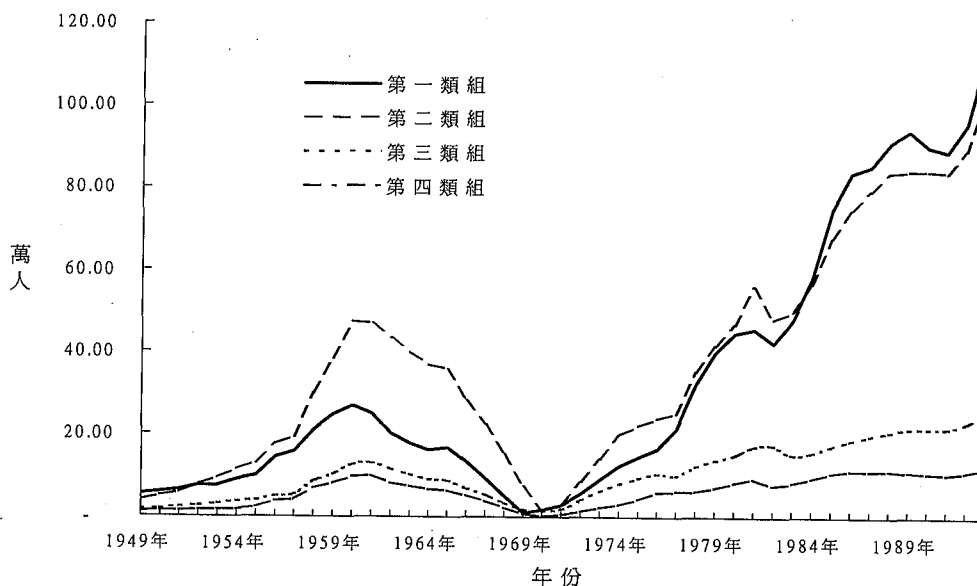
大陸高等教育歷經十年文革嚴重萎縮後，在七十年代後半期高等教育總體規模年平均成長率為 18.6 %、在八十年代後半期年平均成長率為 9.3 %，在同期間日本為 1.4 % 和 0 %，美國為 1.6 % 和 0.4 %，蘇聯為 1.5 % 和 -0.5 %，西德為 3.3 % 和 4.9 %，英國為 2.4 % 和 5.0 %，加拿大為 3.5 % 和 5.8 %，巴西為 5.3 % 和 2.1 %，大陸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從一九七九年的 102 萬人，增至一九八八年的 206 萬；每萬人中的大學在校學生從一九八〇年的 11.5 人，增至一九八八年的 18.8 人。^⑦至一九九九年更多達二百七十萬本科大學生，衡量該年大陸教育體系的一億四千萬小學生、六千萬中學生和高等教育在結構上仍然比例失衡，目前僅容納 9 % 的大學學齡人口，因而中共擴大大學容量，使二〇〇〇年的高校入學率達 11 %，並計劃在二〇一〇年時增為 15 %。

大陸高校的發展方向，可以由其分科教育的規模看出來。中國大陸普通高校一般分為綜合大學、工業院校、農業院校、林業院校、醫藥院校、師範院校、語言院校、政法院校、體育院校、藝術院校、軍警院校。若一一敘述其發展將得十餘條線形，若大陸學科轉成國內大學院校分組方式彙編成四類組，則得圖二。圖二之一鳥瞰大陸五十年來高教發展，顯示文革為最大挫折，全體教育容量為之銳減，開放改革以後則逐步恢復，甚至於超越文革前。圖二之二為近六年來細圖，第一類組即理工教育成長最大，超過了其他三類組的總招生人數；第二類組即文科教育在開放改革以來不受市場經濟的重視，招生人數急速銳減中。

註⑦ 國家發展中心編，中國教育發展的宏觀背景現狀及展望（北京：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頁220。



圖 二



資料來源：新中國五十年統計匯編，1998。

備註 1：由於大陸高校分科衆多，編者將大陸學科轉成國內大學院校分組方式彙編成四類組。

備註 2：大陸高校自 1994 年起重新分組。

資料來源：1. 一九九九年中國統計年鑑。2. 新中國五十年統計匯編，1998。

整體教育經費投資成長趕不上高教規模擴充的成長，中共把 600 多所普通高校按共建、調整、合作、合併等形式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將主要由「教育部」及其他中央部會轄下高校撥轉給地方政府，以減輕中央財政負擔。高等學校多年來由國家「包學費」、「包分配」的招生和畢業安排方式，招生改爲繳費上學，畢業改爲「供需見面、雙向選擇」畢業生自行謀職。目前大學學費在兩三千人民幣之譜，造成家庭艱苦學生的難題。

大陸高等教育在數量和品質兩方面，距世界先進水準差距甚大，因而一九九五年後已啓動「211 工程」，在二十一世紀培養一百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學者。中共每年也派遣留學生出國，並爭取他們學成歸國。從一九九九年每年評選百篇博士論文，支持其獲獎後留校工作，並獎助三十五歲以下取得科研成果的未來教師。但是留學生赴海外後滯留不歸，以及高等教育所培訓師資流向企業市場而不肯留在學校體系，則是市場經濟發達以後的人才流動問題。所以中國大陸高校師資，雖然教授、副教授人數在增加，但有博士學歷的仍不敷所求，以致九〇年代仍然有學歷條件不足的「教員」兩萬多人寄身高校師資行列中見（表八）。

表八 中國大陸高校師資概況表

年份	合計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教員	合計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教員
1947	16,940	6,816	2,514	3,426	4,184		100 %	40.2 %	14.8 %	20.2 %	24.7 %	
1949	16,059	4,786	2,168	3,742	5,364		100 %	29.8 %	13.5 %	23.3 %	33.4 %	
1950	17,310	5,154	2,336	4,033	5,796		100 %	29.8 %	13.5 %	23.3 %	33.5 %	
1951	22,960	5,549	2,840	5,697	8,874		100 %	24.2 %	12.4 %	24.8 %	38.6 %	
1952	27,089	5,223	2,939	6,923	12,004		100 %	19.3 %	10.8 %	25.6 %	44.3 %	
1953	33,639	4,792	2,981	7,495	18,362		100 %	14.2 %	8.9 %	22.3 %	54.6 %	
1954	38,835	4,746	3,005	8,662	22,422		100 %	12.2 %	7.7 %	22.3 %	57.7 %	
1955	42,066	4,522	2,977	10,095	24,472		100 %	10.7 %	7.1 %	24.0 %	58.2 %	
1956	58,346	4,558	3,337	15,573	34,878		100 %	7.8 %	5.7 %	26.7 %	59.8 %	
1957	70,018	4,615	3,453	17,464	44,486		100 %	6.6 %	4.9 %	24.9 %	63.5 %	
1958	84,993	4,315	3,215	13,025	47,354	17,084	100 %	5.1 %	3.8 %	15.3 %	55.7 %	20.1 %
1959	99,657	3,936	3,073	13,306	60,931	18,411	100 %	3.9 %	3.1 %	13.4 %	61.1 %	18.5 %
1960	139,142	3,674	3,089	21,274	83,555	27,550	100 %	2.6 %	2.2 %	15.3 %	60.1 %	19.8 %
1961	158,736	3,871	3,529	24,358	98,100	28,878	100 %	2.4 %	2.2 %	15.3 %	61.8 %	18.2 %
1962	144,371	3,815	3,947	27,576	89,015	20,018	100 %	2.6 %	2.7 %	19.1 %	61.7 %	13.9 %
1963	137,925	3,713	4,472	29,553	86,943	13,244	100 %	2.7 %	3.2 %	21.4 %	63.0 %	9.6 %
1964	135,176	3,653	4,416	29,489	86,739	10,879	100 %	2.7 %	3.3 %	21.8 %	64.2 %	8.0 %
1965	138,116	3,506	4,382	29,200	89,417	11,611	100 %	2.5 %	3.2 %	21.1 %	64.7 %	8.4 %
1977	184,960	2,228	3,531	27,344	110,478	41,319	100 %	1.2 %	1.9 %	14.8 %	59.7 %	22.3 %
1978	206,254	2,709	5,467	40,277	112,793	45,008	100 %	1.3 %	2.7 %	19.5 %	54.7 %	21.8 %
1979	236,637	3,114	8,509	87,509	78,907	58,598	100 %	1.3 %	3.6 %	37.0 %	33.3 %	24.8 %
1989	397,365	15,318	82,899	148,196	136,841	14,111	100 %	3.9 %	20.9 %	37.3 %	34.4 %	3.6 %
1990	394,567	15,052	84,150	148,428	134,730	12,207	100 %	3.8 %	21.3 %	37.6 %	34.1 %	3.1 %
91/92	390,771	15,706	83,788	150,513	117,112	23,652	100 %	4.0 %	21.4 %	38.5 %	30.0 %	6.1 %
1993	387,808	24,385	95,360	162,543	83,801	21,719	100 %	6.3 %	24.6 %	41.9 %	21.6 %	5.6 %
1994	396,389	28,281	102,114	168,683	76,573	20,738	100 %	7.1 %	25.8 %	42.6 %	19.3 %	5.2 %
1996	402,469	33,276	110,640	161,863	75,423	21,267	100 %	8.3 %	27.5 %	40.2 %	18.7 %	5.3 %
1997	404,471	35,914	114,278	156,791	76,561	20,927	100 %	8.9 %	28.3 %	38.8 %	18.9 %	5.2 %
1998	407,253	36,713	115,897	154,515	78,419	21,709	100 %	9.0 %	28.5 %	37.9 %	19.3 %	5.3 %
1999	425,682	39,359	125,900	156,390	83,196	20,837	100 %	9.2 %	29.6 %	36.7 %	19.5 %	4.9 %

資料來源：1. 全國高等學校師資管理研究會編，高校師資管理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6年），頁16。

2. 自一九八九年中國教育年鑑至一九九九年中國教育年鑑。



四、鄧小平教育路線持續遵行

一九九四年中共在「國家教委」內成立了「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已經在教育部門興起了學習鄧小平理論的宣傳活動。而在鄧小平逝世後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會議上，更進一步確立了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中共提倡學習鄧小平理論，其實是學習鄧小平教育理論，目的就是更大步伐地促進教育的革新與發展。^⑧

當前大陸教育政策的重大工作諸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素質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改革高校管理體制、改革高校招生併軌制度、高校黨建工作、高校科研工作、教育教學改革、師資隊伍建設、教職工住房建設等等，這些政策其實都能自鄧小平理論得到啓發。前節提及鄧小平教育政策的持續是基本的，些微政策變遷無傷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性。中共十五大上把鄧小平理論高舉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號召全國各族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副總理李嵐清曾分析《鄧小平文選》一、二、三卷的233篇，絕大部分為開放改革近二十年來所作，尤其第三卷的60%文章都是專門論述教育、科技方面，因而估論鄧小平思想的重心是「科教興國戰略思想」。^⑨

五、中共多元籌措教育經費得當

在學習鄧小平教育思想，並確立「科教興國」的政策目標下，未來中共若是能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育品質，保證教育優先的發展地步，或許可以審慎的態度作出樂觀預期。然而九〇年代中國大陸財政性教育經費尚不及GNP的3%，衡量同期同樣發展中國家已達到4%的教育投資於GNP的比重，實為不足。雖有一九九三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一九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都做出4%目標的確立，但即使年年達此目標，距離已開發國家一般平均6.2%GNP的水準仍大嘆不如。所以一九九三年〈教改和發展綱要〉、一九九四年〈教育法〉提出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建立「財」、「稅」、「費」、「產」、「社」、「基」六條經費來源，做出支出、增長與管理的明確規定。

不過「窮國辦大教育」，大陸靠政府財政預算以外的道路在七年間（一九八五～一九九一）籌款1,000多億人民幣，興建了2.75億平方公尺中小學校舍，改造破舊1.6億平方公尺，消除危樓4.23億平方公尺，使危險性中小學校舍由八〇年代的16%下降到3%。^⑩捐資興學蔚為風氣，使廣大農村出現最好的房子在學校的喜訊，「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看來是符合大陸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

* * *

（收件：90年10月25日，修正：91年3月2日，再修正：91年3月13日，接受：91年5月16日）

註⑧ 「深化教育改革，促進教育發展—五談學習鄧小平教育理論」，中國教育報（北京），1998年7月21日，第1期。

註⑨ 李嵐清撰，「認真學習鄧小平教育理論牢固樹立科教興國戰略思想」，載人民日報，1998年7月13日，版5。

註⑩ 「教育部」辦公廳直屬黨委編，鄧小平教育理論指引下的中國教育二十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66～67。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inland China

Sheng-chi Liu

Abstract

Chairman Mao Tse-tung placed great priority on practicing what he preached; “practical theor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became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the early days, Mao had already advocated learning by doing.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stresses the experiential ideology in talking; it is consistent with Mao's later objections to reading more books, his disregard for “book worship” and his derision of rational knowled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Mao wanted to turn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to the “Yenan model of Anti-Japanese University”, believing that “education should serve the politics of the masses and needs to combine with labor production.”

However, Liu Shao Qi and Deng Xiaoping, who were in the forefront of promoting educational policy, chose to use the educational style of Soviet Russia; the educational goal was to “develop both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st” people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Mao's educational route came into frui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taking a big step backwards.

Deng Xiaoping was responsible for putting things righ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hoped to rebuild Mainland China into a country with a distinct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and with economic building as the core, he insisted in reform and openness, as well as the execution of four basic principles. He advocated the “one core, two basic points” route. Around this concept and conclusion, the tenet was that the basic mission of a socialist society is to develop productivity and to concentrate strength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was formed. Under Deng's leadership, this basic direction, which is centered on economic building, became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the 11th Party Congres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also began the Deng Xiaoping era of change; education to ser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m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battle strategy of a “nation with flourishing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After succeeding Deng, Jiang Zemin expressed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Deng Xiaoping's route of change and openness. During the 12th and 13th Party Congresses, he categorized education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national strategy. During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Jiang pointed ou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placing education as a top priority fo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Party Congress and the 9th People's Congress, Jiang expressed his plans to follow the road taken by Deng Xiaoping. Overall, there was a major emphasis on education; however, budget allocation for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priority given was smaller than those during Deng's time.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policy

